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吉城日记（上）

吉城 著 吉家林 整理 柳向春 审订



凤凰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吉城日记（上）

吉城 著

吉家林 整理

柳向春 审订

本辑执行主编 徐雁平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吉城日记 / 吉城著 ; 吉家林整理 ; 柳向春审订.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8.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五辑)
ISBN 978-7-5506-2796-3

I. ①吉… II. ①吉… ②吉… ③柳… III. ①吉城
(1867-1928) — 日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114号

书 名	吉城日记
著 者	吉 城 著 吉家林 整理 柳向春 审订
责 任 编 辑	陈晓清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b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邮编:226300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32.625
字 数	848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796-3
定 价	162.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音實難知，知實難達，達其
知音，千載其一乎！（又）心雖在，
知音之今，後新編稀見史料，
刊，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吉城晚年像（1867—1928）

素齋日記

光緒三十二年

又廿三年
又廿四年

吉城題簽的日記封面

初九日 錄李林詩 廊中李龍區暢談李龍區謝世泉之聘
將往揚州

初十日 稿鈔李林詩畢 還淑齋

十一日 看續富國策其種戶造帝說云竹之為物編地球
皆多之惟中國獨有之種橡製膠說云西人視全地球中惟
歐洲之意大利美國之舊金山中國之雲南有此樹中國與英
商畫緬甸時誤以迄西貢并及膠樹之地得英之人往去者以為
一日之間驟獲二寶焉

青溪

大著詩三精為郵學派自有真傳欣佩矣似佳稿
陸士就一拜奉

趙此止

鳳輝仁兄著序

弟為

詞遠交東南派較之吾鄉之

詩詞亦和焉荷

可日為序 石園

繆荃孫致古城書札

光緒二十八年

正月大達壬寅 十二日雨水二十七日立為蟄

初一日壬戌天候驟煦萬物皆春 過白石論漢時為蟄在

雨水先今在雨水後今在春驚蟄即夏至之啟蟄也

有云正月必雷之石必聞雜書惟難為必聞之雜書能則蟄之於

地下之雷若在雨水後有入二月者矣生時雷已為春蟄已

咸振冬所謂也

初二日 南園雅集三兄與李龍園甚

吉城日記手稿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

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罕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罕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罕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罕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

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助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吉城是我的曾祖父，他是江苏东台人（祖居丹徒、籍贯丹阳），字凤池（凤墀），别字经郛、更婴、完仲，号曾甫（曾父），云阳吉氏丹徒支22世，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经史学家、教育学家、诗人、书法家、文博收藏家。

吉城的曾祖吉宗沅（盈科）是清嘉道年间“京江诗派”诗人，盈科公与丹徒著名诗人余京（江干）等曾组建诗社，并撰有《竹深吟榭诗钞》。咸丰年间，吉城的伯祖父吉森和祖父吉棣为避太平天国战事，举家自镇江丹徒迁徙苏北，寓居东台县城。为谋生计，吉城的祖辈和父辈均在东台经营商号“吉泰和”，销售南北货。

晚清之时，像吉氏一样从外地迁居东台的家族很多，这些家族大多是官商人家，因避战乱而从苏南、皖南、浙北等地迁徙苏北。那时江南战火如荼，可地处黄海之滨一隅的东台恰似世外桃源，商贸繁荣，文化发达，本地和外地人士都能在这里读书学习、安居乐业。斯时，很多寄寓东台的镇江籍、徽州籍、杭州籍官商子弟很快就与东台本地学人融合到一块了，他们从小就在一起投师受业，读书赶考；吟诗作对，舞文弄墨；以文会友，集会研学，形成了一个跨越籍贯的“东台文人学者集群”。据不完全统计，自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九年的36年间，“东台文人学者集群”里经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而考中进士者就有陈宝（东台籍）、丁立瀛（镇江丹徒籍）、丁立钧（镇江丹徒籍）、夏寅官（东台籍）、刘嘉斌（镇江丹徒籍）、卢元璋（镇江丹徒籍）、周应昌（东台籍）、徐谦（徽州歙县籍）、武曾任（杭州钱塘籍）等人（其中陈宝、丁立瀛、丁立钧、夏寅官、徐谦五人还被钦点为翰林），平均每

科都能出一名进士,至于考中举人、贡生、生员者则为数更多、比比皆是。

就在上述家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吉城于清同治六年八月二十日(1867年9月17日)出生于江苏东台城。

吉城幼时,祖父吉棣即与父亲吉煌、伯父吉焕商定:将来“吉泰和”商号经营不需所有孙辈都参与,为崇尚儒学,继承曾祖盈科公的学问,可以商养学,各自挑选一子,培养其“学而优则仕”。于是,吉城(吉煌次子)和他的堂兄吉墉(吉焕次子)自小即被祖父及父辈指定为读书举业之人,从而走上了一条“从学、考学、教学、治学”的为学之路。吉城幼时,祖父吉棣就开始教他吟咏陆游等人的诗句了。

同治十一年(1872),吉城6岁(虚岁,下同),师从丹徒侨居东台的宿儒孙大生与丁绍钱,受“四书五经”。光绪二年(1876),吉城10岁,始读“春秋三传”。光绪六年(1880),吉城14岁,经丹阳县试、镇江府试后,又应庚辰科童生院试而受知于江苏学政黄体芳宗师,一举进生员并拨为镇江府学。光绪八年(1882),吉城16岁,首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取。光绪九年(1883),吉城17岁,经岁考由附学生员递补为增广生员。光绪十一年(1885),吉城19岁,第二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取。光绪十二年(1886),吉城20岁,在岁考中受知于江苏学政王先谦宗师,并与兴化籍生员李详一起成为王先谦门下入室弟子。

光绪十三年(1887),吉城21岁。自该年起,吉城除继续应生员岁试、科试和江南乡试外,还参加了东台西溪书院、东台三贤书院、上海求志书院、上海格致书院、宁波辨志书院的各种课考,并享受各书院颁发的膏火(津贴)。与此同时,吉城在东台城内开设了一家私塾馆,以课书授徒为生,兼教亲友子弟。除此之外,吉城还自该年起开始撰写日记,并坚持了25年之久。

光绪十四年(1888),吉城22岁,第三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虽未中举,但因岁考成绩优异而补为廪膳生员,享受廪饩(米粟补助);